

這個演變過程中，士紳階層是促進白堠變遷的最為核心的力量，而「鄉村」也正是在士紳們的有意建構下才得以形成。

作者對翔實豐富的文獻資料進行了嚴謹細緻的梳理和考辨，顯示出很強的文獻解讀能力。竊以為，這也為作者進一步對白堠村的經濟發展、村落關係等方面進行更為深入的挖掘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而從研究方法的實踐和鄉村社會長時段研究闕如的角度來說，肖文評這部著作無疑是以歷史人類學方法進行鄉村社會長時段研究的最為成功的範例之一。

徐爽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421頁。

楊念群可謂學界中的「話題人物」，當年《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甫出，就引起熱論，這本作為其「三部曲」完結作的《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自2010年出版以來，各種爭議就在學界持續發酵，形成一陣討論熱潮。

本書以「江南」為書名，但區域研究絕不是本書的主旨。在導論中，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的目的是探究清朝早期「滿人」和「漢人」之間如何在一種廣義上的「地人關係」基礎上建立起歷史意識的聯繫」（頁1）。也就是說，「江南」在本書中並非一個實在的地域概念，而是一種觀念，或者說存在於皇帝與士人頭腦中的想像（頁12）。

從這一論旨出發，作者在第一章分析了「殘山剩水」的意象在明末清初的背景中對於士人具有的特別意義。第二、三章繼續討論在政治鼎革背景下士人的轉型與選擇。「歸隱」的士人對地方教化形成了新的影響，而在清初的「經筵會講」中，士人與君王的教化關係相對明代發生了逆轉。如呂留良這樣的遺民領袖在生計與精神追求中尋找平衡，使其編纂的科舉時文批選隱然消解着清王朝的正統權威。第四、五章通過「文質之辨」討論康、雍、乾三代君王與士人關係的演變。第六章梳理「正統觀」的譜系，以此說明清代帝王如何修正「正統觀」的內涵，從而影響了清代士人描述歷史的方式。在

第七章中，作者不再將「經世」思想視作受到外界壓力催生的改革思想，恰恰相反，「經世」思想是作為日常政治運作的一部份而存在的。第八章對文字獄做了新的闡釋，認為文字獄是「皇家治理技術」的一部份。

將「江南」視作一種觀念而不僅是地域範圍，這並非是作者的首創。此前已經有鄒逸麟注意到這個問題，指出「（清政府）一直是將晚明以來人本主義思想比較濃厚的江南，視為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異質地區，對遠在北京的中央來說，這是一個離不開、信不過的地區」（鄒逸麟，〈談「江南」的政治含義〉，載王家範主編，《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81）。就明清時代來說，如《照世杯》等小說也反映了當時人普遍將七府一州視作「江南的範圍」。因此，儘管本書以江南作為一個觀念史的概念提出問題是非常好的思路，但完全放棄從地域上定義「江南」畢竟給整個行文帶來很多困擾。

最主要的問題，是作者必須在行文中構建起「士林精神」與「江南」之間的關係。本書中被作者指稱為「江南」士人的不僅包括江蘇、浙江、安徽籍士人，甚至還涵蓋了江西，搜羅未免過寬。並且楊氏本身已經將本書的結論之一定位為：「本書證明，清統治者發揮其高超的統治技巧，成功地收編了「江南」士大夫的歷史與價值觀，使之成為「大一統」統治模式的合法性資源。」（頁3）「江南」雖則可以是一種觀念，「江南士大夫」畢竟是一個實在的群體。

又如論及清初士林的文化傳播網絡，作者為了說明存在一個以「江南」為核心，其他地區相互影響的思想、學術傳播網絡，以屈大均為例來說明這一網絡對其他地區的思想、學術的傳播，最後結論為：「乾隆的腦子裡則有一幅更為複雜的政治空間地圖，這幅地圖不僅要遏制「江南」學問的擴散影響，同時還要設法阻斷外地流入江南的思想之流，以防禦其與之合流或為之提供源頭活水」（頁359）。就文獻解讀來說，這樣的說法未免牽強。

在分析曾靜案時，本書將曾靜所處的湖南與「江南」相對照，形成一幅「蠻夷」與「文明」對比的圖景。而曾靜從呂留良著作中吸收觀點，就變成了以江南為軸心向四周傳播「思想之流」的證明。雖然湖南確實存在着漢民與少數族群雜處的地域，但是無論如何，到了清代前期，湖南都難以被視為一個未開發地區，作者在完成自己的這個「從文明到蠻夷」的「思想之流」的傳播的論證時，對於曾靜所處地區的「蠻夷」狀態，差不多是以猜測為依據進行論證，因而這一「思想之流」的模式，恐怕是建立在一種比較薄弱的論證基礎上。

從江南這一題目出發，作者的討論重點還是從鼎革到乾隆年間士人精神狀態的變化，以及四位皇帝應對士人的不同策略。此中的歷史脈絡，是清初士林如何對一個異質性的政權保持反抗與疏隔，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經營，在「勢」與「理」兩個層面被規訓。士林的學術旨歸從潛含對抗政權的危險，轉變為政權合法性的支撐。儘管作者在通篇未曾提及，但不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明顯感覺到布迪厄「共謀」概念的氣息。作者使用了「合流」一詞，其實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本書的整個敘述框架中，這種「合流」是清初思想史脈絡轉變的總趨勢，也自然成為全書潛伏的主線。

本書有三方面討論特別值得注意。其一，是他所提煉的「南宋—晚明」模式，其二是以「文質之辨」為路徑梳理清初思想變化的趨勢，其三是對「經世」觀念的重新理解。

作者認為在明代中後葉出現了一個將南宋與晚明進行對比的趨勢，特別是在這一時段，發生了兩種變化趨勢，一是「南」與「北」作為意象的強烈對比，形成了「南」代表「文」，「北」代表「質」，「南」代表漢地，「北」代表邊民的觀念（頁172）。二是族群之辨超越疆域佔領成為「治統」或者說統治合法性的來源。南宋的偏安態勢作為造成這兩種趨勢轉變的關鍵背景，已經為作者所提煉出來，不過偏安所激發的緊張感、焦慮感是否是「南」「北」對立觀念的唯一思想資源，還可以有更多考慮。關於「南」「北」意象的對立，最早可以追溯至《中庸》：「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而強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中庸》是文化中心尙處於北方之時代產生的文獻，彼時的「江南」（長江以南），尙是半開化地帶，然而「南」與「北」的意象，已經被賦予了這樣的內涵，這是不能用偏安心理所予以解釋的。其實，錢鍾書已經指出，以為南方溫暖濕潤，因而人的性格相應柔軟，北方寒冷乾燥，人相應剛烈，是在北半球的東西方世界中都曾經普遍抱有的觀念（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1034）。漢代仲長統說「北方寒而其人壽，南方暑而其人夭」（嚴可均輯，許振生審訂，《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卷89，〈昌言下〉，頁902），便是這一道理。至少是經過這一重形象的疊加，宋明時代的「南」「北」意象對立才會非常強烈地凸現，而且歷久不衰。

與此問題相接續，所謂的「文質之辨」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為何南方代表了「文」，北方代表了「質」，是一個在相當長遠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漢代的脈絡中予以討論的問題，僅僅以清初的滿洲入主中原作為敘述框架，可

以自圓其說，但解釋力不足。所以不得不說，雖然本書以一個地域觀念作為題名，卻始終沒有完滿地處理「江南」觀念在其敘述脈絡中的定位，一旦離開了對「南」、「北」意象的討論，進入到士林與皇帝在「文質之辨」的「合流」趨勢時，本書的討論就變得引人入勝。

本書從一種不同的角度理解清初士林學風「質樸」、「考據」等變化趨勢。他分析呂留良、周永年、章學誠等案例，都試圖說明學風的轉變是一種「士林」與皇權政治的合流，而非「士林」對皇權政治的逃避。基於這樣的分析路徑，作者改變了有關「經世」思想的傳統觀念。他認為，在康雍乾三朝這樣的承平世，「經世」思想也始終存在着。「經世」思想並非一定是迫於外界壓力的產物，更應被理解為支撐清代皇權政治的「治道」的重要依託。這是發前人所未發的可貴之處，由此引發的問題更有趣味，即思想與政治態勢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說，一些被後人認為較為「現代」的思想在怎樣的政治態勢下更容易產生。「經世」思想之所以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課題，與「現代化」以及19世紀中國命運的轉折等「情結」密切相關。為思考這一問題提供新的角度與思路，可能作者的最終結論並不重要了。

總體說來，本書雖以「江南」為題目，但重點落在分析士林與皇權的「合流」之勢，更進一步說，對這種「合流」之勢的描述，似乎是在映射20世紀80年代知識界的大同盟如何在90年代分化，以及隨後在各種因素下，一大批知識份子迅速體制內化，形成了知識份子與政府的「共謀」。80年代那種知識份子站在體制外仗義執言的「士氣」愈弱，而知識份子自我審查，努力為體制所認同的「世風」日盛。楊念群所強調的「南宋—晚明」歷史反思模式，也許是合於其回望近十餘年來學界種種變化時慨歎的心境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作者所講的這個故事不僅未必是關於江南的，甚至未必是關於清代士林的。

趙思淵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

山田賢，《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會史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322頁。

移民是塑造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國內相關研究成果豐富，代表性著作為葛劍雄主編的六卷本《中國移民史》，該書重點集中於移民的動機、時